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分解和机理研究

周明海*

内容提要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按就业、报酬和产出进行了解，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由报酬和产值效应相向变动所得的净效应决定，而就业变动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小。同时，区分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情况后，发现剔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分解更能反映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真实情况。利用水平和差分方程，本文不仅考察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而且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机理，发现各变量通过三大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机理尽管各不相同，但均比较符合理论假说和现实预期。其中，产业结构变量的影响最大，其产出负效应超过其他两种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向下的冲击作用，从而支持劳动收入份额的“库兹涅茨事实”。

关键词 劳动收入份额 就业变动效应 报酬变动效应 产出变动效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和经济发展方式迅速转

* 周明海，宁波诺丁汉大学，电子邮箱：Minghai.Zhou@nottingham.edu.cn。本文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要素和个体收入分配的联动机制及其调整对策研究”（批准号：12CJY01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总体框架与具体路径研究”（批准号：11&ZD01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我国就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及实施机制优化研究”（批准号：7117318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一体化水平测量及进程研究”（批准号：71373233）的资助。本文在山东大学第二次“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份额问题高层研讨会”和“第八届中国博士后经济学论坛”上报告过，感谢李实和柳欣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变的背景下实现了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扭曲乃至失衡的态势。从要素分配结构看,劳动收入份额过低且持续下降,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11年的44.9%。从主体分配结构看,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低且持续下降,由1992年的68.7%下降至2009年的60.5%。中国现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和失衡的加剧,一方面直接制约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并造成内需乏力,另一方面也会直接阻碍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延缓国民收入总量扩张的步伐,恶化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目前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分析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成因。一部分研究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转换相结合,认为农业向非农产业转换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工业部门的内部效应也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部分原因(白重恩、钱震杰,2009a;罗长远、张军,2009a;肖文、周明海,2010;钱震杰,2011)。另外一部分研究则更强调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变动等经济转型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造成的影响(白重恩、钱震杰,2009a;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张军,2009b;周明海等,2010; Bai & Qian, 2010)。最近的一些研究开始着重讨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郭庆旺、吕冰洋,2011, 2012)。

尽管探求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本文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与前人均存在显著差异。首先,我们根据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在经济因素将其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出变动效应,从而确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受劳动供给和需求数量、劳动力价格水平和整体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及其程度。其次,我们区分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情况,从而考察价格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分解的影响。最后,我们综合利用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机理。我们得到了与以往研究不同的发现:一是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由报酬和产值效应相向变动所得的净效应决定,就业变动效应的影响相对较小;二是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分解效应可以使我们重新评估和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和原因,从而反映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真实情况;三是各变量通过三大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的影响机理各不相同,其中产业结构变量的影响最大,其产出负效应超过其他两种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向下的冲击作用,从而支持劳动收入份额的“库兹涅茨”事实。因此,我们认为政府调控产业政策的力度、节奏和速度应当以既能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升级的要求,又能使中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分配格局为目标。

二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

(一) 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方法

现有文献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主要基于产业和部门的视角进行探讨。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罗长远和张军(2009a)、肖红叶和郝枫(2009)将中国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分解为结构效应、内部效应和协方差效应,认为产业结构非农化带来的结构效应是中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原因。肖文和周明海(2010)则利用资金流量表分析了企业、住户和政府三大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认为企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所产生的内部效应是总体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主要原因。上述分解主要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外部经济结构入手进行分析,而忽略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在经济因素。然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内在经济因素,如劳动供给和需求数量、劳动力价格和劳动报酬增长与整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等,显然更为根本和重要。因此,我们参照 Kalleberg et al.(1984)的方法,根据劳动收入份额的表达式,将其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值三类变动效应。

劳动收入份额可表示为劳动者报酬与增加值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Ls = \frac{wL}{Y} \quad (1)$$

其中, Ls 为劳动收入份额, w 为平均劳动者报酬, L 为就业人数, Y 为国内生产总值(GDP)。式(1)对时间进行全微分可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进行分解:

$$\frac{dLs}{dt} = \frac{w}{Y} \frac{dL}{dt} + \frac{L}{Y} \frac{dw}{dt} - Ls \frac{1}{Y} \frac{dY}{dt} \quad (2)$$

由于现有数据只给出了劳动者报酬总额 C 和就业人数 L , 因此我们不能直接度量平均劳动者报酬 w 的变动。但我们可以利用 C/L 的变动进行替代:

$$\frac{dw}{dt} = \frac{d}{dt}(C/L) = \frac{1}{L} \frac{dC}{dt} - \frac{C}{L^2} \frac{dL}{dt} \quad (3)$$

将式(3)代入式(2),可得:

$$\frac{dLs}{dt} = \frac{w}{Y} \frac{dL}{dt} + \frac{1}{Y} \left(\frac{dC}{dt} - \frac{C}{L} \frac{dL}{dt} \right) - Ls \frac{1}{Y} \frac{dY}{dt} \quad (4)$$

各变量的瞬时变动是不可观测的，我们可以用离散形式近似替代连续变动。令一阶差分形式为 $\Delta_t Y = Y_t - Y_{t-1}$ ，则式（4）可表示为各变量的差分形式^①：

$$\Delta_t Ls = \left(\frac{w}{Y}\right)_{t-1} \Delta_t L + \left(\frac{1}{Y}\right)_{t-1} \left[\Delta_t C - \left(\frac{C}{L}\right)_{t-1} \Delta_t L\right] - Ls_{t-1} \left(\frac{1}{Y}\right)_{t-1} \Delta_t Y \quad (5)$$

其中，式（5）中括号的下标表示该变量的一阶滞后项。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可以分解为三项可加的部分：就业数量的变动、劳动者报酬的变动以及增加值的变动。讨论劳动收入份额这个复合经济变量就可转化为对就业、报酬和产值三大宏观经济变量的讨论，从而可以区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就业、报酬和产值三类变动效应。从符号上来看，就业和报酬变动作为分子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正，即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就业增加或劳动者报酬提高将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由于增加值作为劳动收入份额的分母，因此其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即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产出增长对劳动收入份额将产生向下的冲击。

（二）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

根据上述分解公式并利用现有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我们可以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进行分解。估算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时，我们区分了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结果如表1所示^②，其中第（2）~（5）列为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第（6）~（9）列为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

表1 1979-2007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分解

年份	名义劳动收入份额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整体变动	就业效应	报酬效应	产出效应	整体变动	就业效应	报酬效应	产出效应
1979-1984	0.04	0.11	0.40	-0.46	0.02	0.09	0.24	-0.31
1985-1989	-0.02	0.08	0.43	-0.54	-0.12	0.07	0.03	-0.23
1990-1994	-0.03	0.06	0.59	-0.68	0.00	0.04	0.17	-0.22
1995-1999	0.02	0.01	0.41	-0.40	-0.03	0.01	0.16	-0.20
2000-2004	-0.05	0.04	0.31	-0.40	0.01	0.02	0.18	-0.19
2005-2007	-0.01	0.04	0.24	-0.29	0.02	0.03	0.14	-0.1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 ① 需要说明的是，差分方程只是微分方程的近似形式，两者完全相等需要在差分方程中添加三个分项的两两协方差以及三项联合协方差。考虑到协方差项是高阶无穷小，我们这里将其省略。具体讨论可参见 Kalleberg et al. (1984)。
- ② 使用省级收入法 GDP 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在2008年缺失，而2009年后又出现大幅度跳跃回升，这可能是由于统计口径重新调整所导致的（张车伟，2012）。因此，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的时间范围限定为1978-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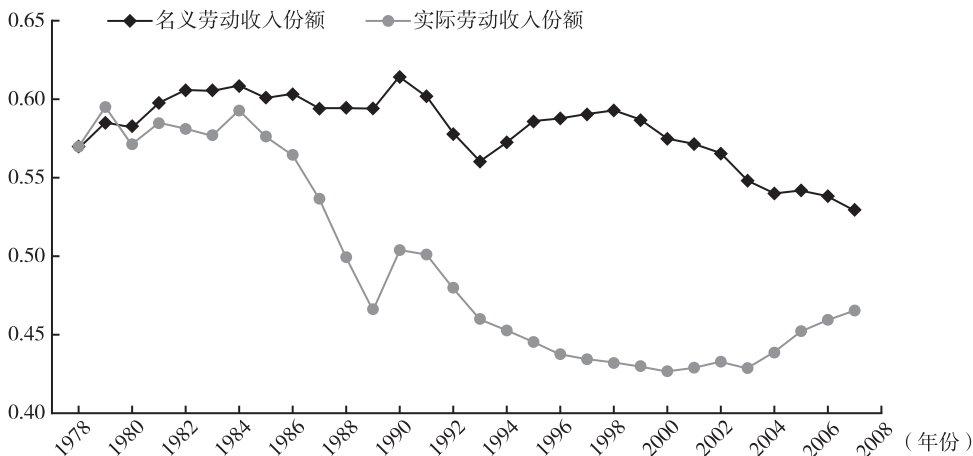


图1 1979—2007年中国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从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变动情况来看（图1），其阶段性变动特征明显。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带来了农民收入提高和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从而使1979—1984年的名义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了4个百分点。此后，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1985—1989年和1990—1994年劳动收入份额分别下降2个和3个百分点，表现为改革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后产生的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的现象。最近一次变化持续时间较长，从1998年开始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基本为负值，表现为改革开放深化和加速转型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现象。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结果表明，三类效应的作用不尽相同（图2）。首先，就业变动效应主要起到提升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且呈现V型变化趋势，最低点与1998年左右国企富余劳动力下岗的短期就业冲击密切相关。其次，报酬变动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拉升作用更为明显，且呈现波动变化，各波峰点分别为1985年、1988年、1994年以及2004年，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变动幅度最大。最后，产值变动效应对名义劳动收入份额起到明显的降低作用，且同样呈波动变化，各波谷点分别为1985年、1988年、1993年以及2004年，其中90年代初期变动幅度最大。综合三类效应的关系来看，就业效应的作用相对较小，报酬和产值变动效应构成镜像关系，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取决于报酬和产值变动的差额。

在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中，报酬和产值变动的波峰和波谷步调一致，且与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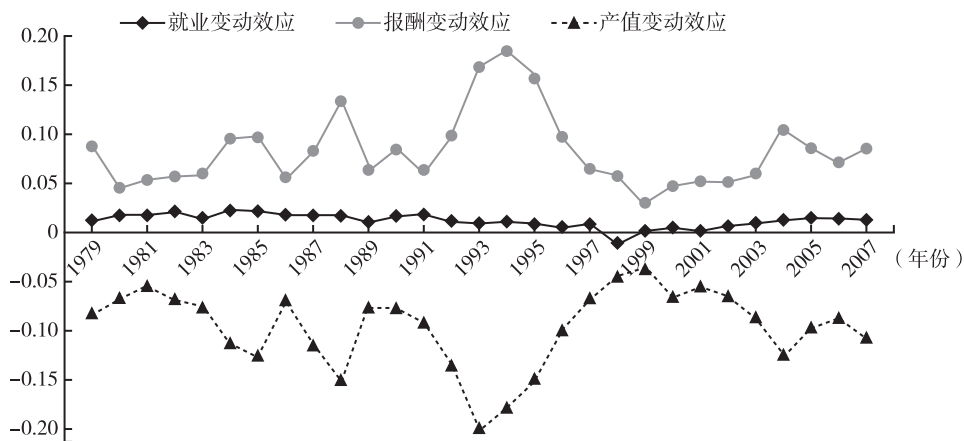


图2 1979-2007年中国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三类分解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货膨胀保持同步^①。因此，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及其分解能够更为真实地反映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及内部结构^②。从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整体变动情况来看（图1），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改革使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较为平稳，此后偏向城市的改革激发了资本的活力，产生了“利润挤占工资”的现象，导致实际劳动收入份额长期保持下降趋势，直至2004年左右开始呈现恢复性上涨，突破U型曲线拐点进入上升渠道。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拐点恰好与反映二元经济结构反差逐步缩小的刘易斯转折点（蔡昉，2010；蔡昉、都阳，2011）保持一致，意味着中国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农民工工资开始较快提高的时期已经到来。同样，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三类分解效应各不相同（图3）。首先，由于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估算不影响就业变量，因此就业变动效应与之前一致。其次，实际报酬变动效应相对名义报酬变动效应较小，其在1979-1990年间的波动较大，1990年以后波动较为平缓。最

① 我们发现报酬变动效应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79，产值变动效应与GDP平减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0.91。

② 周明海（2014）专门讨论了区分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趋势的影响。根据这一研究，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计算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将劳动者报酬除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得到实际劳动者报酬；其次，将国内生产总值除以GDP平减指数得到实际GDP；最后，将实际劳动者报酬和实际GDP相除得到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后，实际产值变动效应相对名义产值变动效应较小，且呈波动上升趋势。综合三类效应的关系来看，就业变动效应的重要性有所加大但仍不起绝对作用，实际报酬和产值变动效应仍呈较弱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净效应决定了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方向和幅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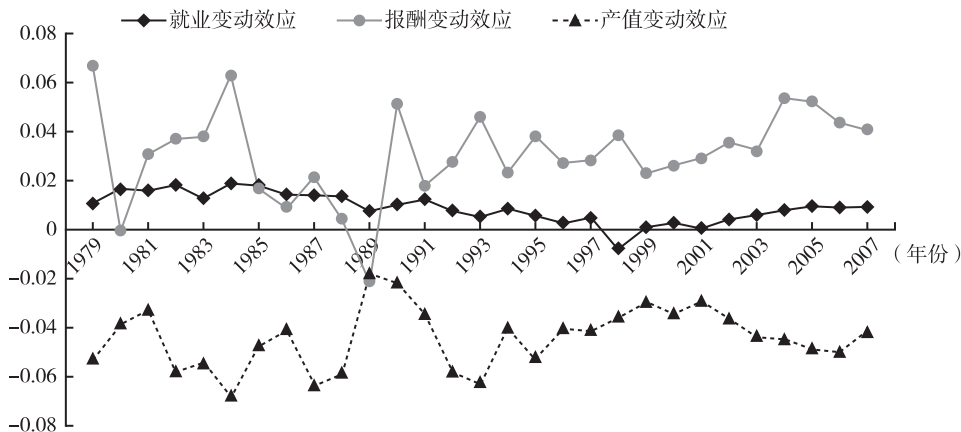


图3 1979-2007年中国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三类分解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

(三) 省级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

各省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结果与全国的情况基本一致^①。首先，各省就业变动效应相对于名义报酬和产值变动效应较弱，整体就业变动效应与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相关性仅为0.029。其次，名义报酬和产值变动效应呈较高的镜像关系，两者的相关性为-0.749，这同样意味着价格波动是导致两者变动高度负相关的重要因素。再次，整体名义报酬变动效应的解释力最大，其与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相关系数达到0.641，整体名义产值变动效应的解释力相对适中，其与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相关系数为0.217。最后，各地区名义报酬和产值变动的综合效应较好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0.906。

同样，各省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结果与全国的情况较为一致。首先，各省就业变动效应仍弱于报酬和产值变动效应，整体就业变动效应与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相关性仅为0.020。其次，实际报酬和产值变动效应仍呈负相关关系，两者的相关性

① 限于篇幅，这里省去了各省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

为 -0.396 。由于剔除了价格因素，两者的相关性已有所降低。再次，整体实际报酬变动效应的解释力最大，其与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相关系数达到 0.724 ，实际产值变动效应的解释力相对适中，其与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相关系数为 0.260 。最后，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方向和幅度由实际报酬和产值的净效应决定，两者的相关系数高达 0.937 。

三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理论机理

(一) 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模型及拓展

在上一节中，我们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值三类变动效应。接下来，我们将构建计量模型，系统阐述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因素和影响机理。Bentolila & Saint-Paul (2003) 以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之间的函数关系为基础，构建了新古典框架下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模型。为了直观，我们用图 4 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令横轴为资本产出比 k ，纵轴为劳动收入份额 S_L ，Bentolila & Saint-Paul (2003) 将其称为 SK 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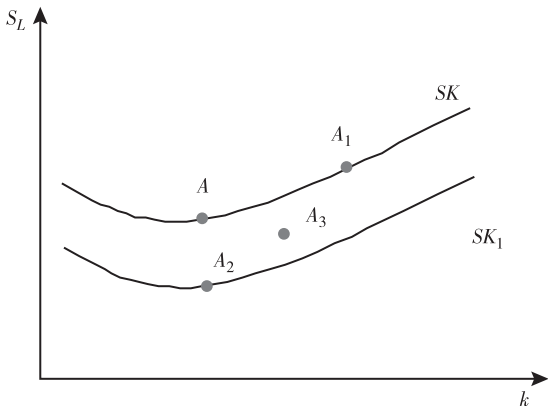


图 4 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的函数关系

Bentolila & Saint-Paul (2003) 认为资本产出比的变动将使劳动收入份额在 SK 曲线上移动，即由 A 点移至 A_1 点，这种效应被称为“滑动”效应。除要素投入比例外的其他因素可能通过两种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一种渠道是通过平移 SK 曲线改变劳动收入份额。若保持资本产出比不变，这种因素将使 SK 曲线上的 A 点平移至 A_2 点，这种效应被称为“平移”效应。另一种渠道是使劳动收入份额偏离初始的 SK 曲线，由 SK 曲线上的

A 点偏移至 A_3 点，这种效应被称为“偏移”效应。这三种效应可表示为如下计量方程：

$$Ls_{it} = \alpha_0 + \alpha_1 KtY_{it} + \sum_{j=1}^m \beta_j SE_{it}^j + \sum_{j=1}^n \gamma_j ME_{it}^j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 Ls 表示劳动收入份额； KtY 为资本产出比，产生“滑动”效应； SE 是产生“平移”效应的因素， ME 为产生“偏移”效应的因素；上标 j 为变量序号，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

我们不仅关心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同时，我们还关心各经济变量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的影响。令劳动收入份额的一阶差分为 $\Delta_t Ls = Ls_t - Ls_{t-1}$ ，则可将式 (6) 转化为一阶差分方程^①：

$$\Delta Ls_{it} = \alpha_1 \Delta KtY_{it} + \sum_{j=1}^m \beta_j \Delta SE_{it}^j + \sum_{j=1}^n \gamma_j \Delta ME_{it}^j + \varepsilon'_{it} \quad (7)$$

在上一节中，我们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出变动效应。根据劳动收入份额的机理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滑动”、“平移”和“偏移”效应如何通过就业、报酬和产出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产生影响。因此，将上述理论解释框架进一步拓展，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每个分解部分构造类似的计量方程。首先，由就业变动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方程可表示为：

$$\left(\frac{w}{Y}\right)_{i,t-1} \Delta L_{it} = \alpha_{11} \Delta KtY_{it} + \sum_{j=1}^m \beta_{j1} \Delta SE_{it}^j + \sum_{j=1}^n \gamma_{j1} \Delta ME_{it}^j + \varepsilon'_{11,t} \quad (8)$$

由平均劳动者报酬变动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方程可表示为：

$$\left(\frac{1}{Y}\right)_{i,t-1} \left(\Delta C_{it} - \frac{C_{it}}{L_{it}} \Delta L_{it}\right) = \alpha_{12} \Delta KtY_{it} + \sum_{j=1}^m \beta_{j2} \Delta SE_{it}^j + \sum_{j=1}^n \gamma_{j2} \Delta ME_{it}^j + \varepsilon'_{12,t} \quad (9)$$

由增加值变动带来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方程可表示为：

$$Ls_{i,t-1} \left(\frac{1}{Y}\right)_{i,t-1} \Delta Y_{it} = \alpha_{13} \Delta KtY_{it} + \sum_{j=1}^m \beta_{j3} \Delta SE_{it}^j + \sum_{j=1}^n \gamma_{j3} \Delta ME_{it}^j + \varepsilon'_{13,t} \quad (10)$$

(二) 变量及理论假说

1. 资本产出比

资本产出比将使劳动收入份额在 SK 曲线上移动，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影

① 与式 (6) 不同，式 (7) 不包含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如常数项和地区固定效应等。

响的方向则取决于劳动和资本间的替代弹性。罗长远和张军(2009b)利用中国各省1987-2004年的数据,发现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他们认为中国由于劳动力丰富,资本积累促进劳均资本拥有量和劳动边际产出提高,这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验证(白重恩、钱震杰,2009b;邵敏、黄玖立,2010)。然而,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利用中国工业企业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较小,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接近1。李稻葵等(2009)利用2000-2004年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资本与劳动比和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这又意味着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

2. 技术进步

Bentolila & Saint-Paul (2003)认为技术进步可以通过平移SK曲线使劳动收入份额发生变化,为“平移”效应。Acemoglu (2003)认为当经济处在转型阶段时,技术进步呈现资本增强型,SK曲线向下平移至 SK_1 ,劳动收入份额由A点移至 A_2 (见图4)。这意味着在经济转型路径上运行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将受到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黄先海和徐圣(2009)通过引入希克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认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有70%可用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效应进行解释。然而,中国的技术进步不仅呈现出要素偏向特征,也体现为技能偏向特征(潘士远,2007;宋冬林等,2010)。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通过降低非技能劳动力需求和提高物质资本收益两种渠道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王永进、盛丹,2010;翁杰、周礼,2010)。然而,在实证上,技术进步既可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也可用科研费用投入比例、新产品销售比例表示。由于测度的差异性,学术界关于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些研究得到了显著的负效应(黄先海、徐圣,2009;翁杰、周礼,2010),有些研究的结果并不显著(白重恩、钱震杰,2009b;罗长远、张军,2009b)。

3. 开放因素: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

劳动收入份额还可能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初始的SK曲线,开放对劳动收入份额就会产生这样的“偏移”效应。开放因素是指商品和要素全球化流动,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不同理论框架内存在差异。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使各国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并促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将增加国内相对充裕要素的需求和利用,减少相对稀缺要素的需求和使用,从而充裕要素的收入份额将提高而稀缺要素的收入份额将降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劳动相对于资本要素更为充裕,因此新古

典贸易理论预测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将呈上升趋势。新近发展的基于企业异质性的贸易理论认为，从事国际贸易的企业往往是规模大、生产率水平高的企业（Melitz, 2003; Helpman et al., 2004）。根据该理论，一国出口贸易的增加将使国内高生产率的企业迅速扩张，因而出口贸易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就实证来看，国际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也是不明确的。一些研究发现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正面影响，支持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预测（姜磊、张媛，2008；邵敏、黄玖立，2010；翁杰、周礼，2010）。然而利用基本相同的数据，另一些研究则给出了出口效应不显著的结论（白重恩、钱震杰，2009b；罗长远、张军，2009b）。

衡量开放的另一因素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学术界关于 FDI 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效应也存在理论分歧。Dunning（1988）的特定区位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的资源和要素禀赋决定了其吸引外资的类型，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选择投资于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则更可能选择投资于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这意味着 FDI 使东道国中要素相对充裕的部门进一步扩张。因此，FDI 应当能够提高该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收入份额。同样，基于企业异质性框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两种效应（Decreuse & Maarek, 2008）。首先，外资企业为了吸引东道国劳动力从而支付高工资，这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称为“工资竞争效应”。其次，外资企业由于拥有先进技术和较强融资能力使其生产效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这将导致东道国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称为“生产效率差异效应”。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效应将取决于工资竞争和生产效率差异两种效应的大小。当前者小于后者时，东道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将因为外资进入而下降（Decreuse & Maarek, 2008）。结合中国的实际，罗长远和张军（2009b）认为地区间在招商引资时的竞争可能是资本谈判能力被强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将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使资本谈判能力上升，并弱化了劳动力的谈判地位。外资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不同省份间转移，而劳动力却因户籍制度等因素的约束存在流动障碍。他们的研究表明 FDI 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双向负向关系，他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展开的竞争弱化了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外资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吸引的流入性动机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邵敏和黄玖立（2010）也得到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效应，然而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负向的“工资溢出”效应所导致的。

4. 转型因素：产业和制度结构变动

对于中国来说，新古典框架和开放等因素仍不足以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

现象。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对于理解中国经济运行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制度转型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变化。与开放因素一样,包括产业和制度结构变动的转型因素将使劳动收入份额偏离SK曲线,产生“偏移”效应。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迈进,从产业结构来看,其显著特征是农业部门比重的持续下降和工业部门份额的迅速上升。不仅如此,李稻葵等(2009)认为,中国以城市化和工业化特征为特征的经济的发展将使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因此,中国经济转型中的非农化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释目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李稻葵等,2009;龚刚、杨光,2010a,2010b;白重恩、钱震杰,2009a;罗长远、张军,2009b;肖文、周明海,2010)。

经济结构的变动也表现为制度结构的变化。国企改革、民营化和外资进入是所有制结构变化的三大特征。国有企业由于政策负担和预算软约束而相对低效(Lin & Tan, 1999;林毅夫、李志赟,2004),外资企业由于其母国具有先进技术和资金支持而相对高效(Decreuse & Maarek, 2008)。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以国企改革、民营化和外资进入为特点的所有制结构将通过提高经济效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周明海等,2010)。白重恩等(2008)、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使用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工业企业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7个百分点。罗长远和张军(2009b)则得到了民营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效应,他们认为民营化后企业报酬支付更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富余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供给冲击,对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对于外资进入的效应,我们已从开放的角度加以论述,其效应也是负的。

四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一) 水平方程的计量及结果

我们首先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根据上一节关于变量的讨论,可将式(6)的具体计量方程表示为:

$$Ls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KtY_{it} + \beta_1 \ln Tfp_{it} + \gamma_1 Expt_{it} + \gamma_2 Impt_{it} + \gamma_3 Fdi_{it} + \gamma_4 Sir_{it} + \gamma_5 Tir_{it} + \gamma_6 Soe_{it} + \gamma_7 \ln Rpgdp_{it} + \gamma_8 (\ln Rpgdp_{it})^2 + \varepsilon_{it} \quad (11)$$

其中, Ls 为劳动收入份额,我们将其定义为劳动者报酬占扣除生产税净额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中1978-1992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1993年数据来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对于

2004 - 2007 年数据，我们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并用就业数据调整得到。 KtY 为资本产出比，用资本存量与 GDP 的比值表示，用以衡量要素投入情况。 Tfp 为利用索罗余值法计算的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用以衡量技术进步。单豪杰（2008）利用永续盘存法获取了 1978 - 2006 年的资本存量数据，我们根据该方法对 2007 年的数据进行了补充，从而计算出资本产出比（ KtY ）和技术进步（ Tfp ）变量^①。 $Expt$ 为出口贸易额在 GDP 中的比重，衡量对外贸易的效应。 $Impt$ 为进口贸易额在 GDP 中的比重，衡量进口渗透率的作用。 Fdi 为外资流入量与 GDP 的比值，这一方面衡量开放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动。 Sir 和 Tir 分别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Soe 为国有企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衡量所有制结构中的国企改革效应。此外，劳动收入份额也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一些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呈 U 型曲线变化（李稻葵等，2009；罗长远、张军，2009a）。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实际人均 GDP（ $Rpgdp$ ）及其平方项来控制经济发展水平效应。各自变量数据均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性描述和数据说明如表 2。

表 2 变量名称及其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名义劳动收入份额	882	0.522	0.100	0.227	1.000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882	0.428	0.135	0.149	1.000
资本产出比	900	1.808	0.702	0.202	4.213
技术进步	882	1.055	0.383	0.478	3.076
对外贸易	882	0.133	0.212	0.001	1.937
进口渗透率	882	0.129	0.331	0.000	3.259
外商投资	882	0.021	0.033	0.000	0.243
第二产业比重	882	0.434	0.100	0.119	0.774
第三产业比重	882	0.326	0.092	0.130	0.721
国企改制	900	0.618	0.187	0.115	1.036
实际人均 GDP	900	19.66	25.04	0.000	252.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 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 2004》、2006 - 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得到。

① 有关资本产出比的计算方法有两种：一是利用永续盘存法计算以 1952 年为不变价的资本存量，然后将该资本存量除以 1952 年为不变价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到不变价的资本产出比；二是将以 1952 年为不变价的资本存量还原为现价的资本存量，然后除以现价的国内生产总值，得到现价的资本产出比。我们综合两种方法，选取较为合理的资本产出比值。

我们首先采用地区面板数据对模型（11）进行估计。我们选取的样本为 1978 - 2007 年中国 30 个地区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模型根据对截面固定效应的不同假设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我们依据 Hausman 检验选择判断适合的估计模型。表 3 中给出了 6 个模型的估计结果，Hausman 检验结果表明我们应该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其中，第（1）~（3）列为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水平方程，第（4）~（6）列为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水平方程。

表 3 水平方程的基本估计结果

变量	名义劳动收入份额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1)	(2)	(3)	(4)	(5)	(6)
资本产出比	-0.0955 *** (0.00433)	-0.0237 *** (0.00350)	-0.0276 *** (0.00392)	-0.112 *** (0.00720)	-0.0184 *** (0.00522)	-0.0219 *** (0.00559)
技术进步	-0.229 *** (0.00781)	-0.0934 *** (0.00655)	-0.0981 *** (0.00724)	-0.192 *** (0.0130)	-0.0517 *** (0.00978)	-0.0649 *** (0.0103)
对外贸易		0.0281 ** (0.0119)	0.0236 * (0.0120)		0.0388 ** (0.0178)	0.0221 (0.0172)
进口渗透率		-0.0273 *** (0.00728)	-0.0268 *** (0.00725)		-0.00736 (0.0109)	-0.00469 (0.0104)
外商投资		-0.189 *** (0.0541)	-0.183 *** (0.0568)		-0.622 *** (0.0808)	-0.552 *** (0.0811)
第二产业比重		-0.672 *** (0.0222)	-0.629 *** (0.0277)		-0.765 *** (0.0332)	-0.556 *** (0.0396)
第三产业比重		-0.344 *** (0.0260)	-0.277 *** (0.0401)		-0.869 *** (0.0388)	-0.524 *** (0.0572)
国企改革		0.0302 *** (0.0108)	0.0256 * (0.0139)		0.0882 *** (0.0161)	0.0463 ** (0.0199)
实际人均 GDP			-0.0302 *** (0.00986)			-0.133 *** (0.0141)
实际人均 GDP 平方			0.00441 *** (0.00160)			0.0174 *** (0.00228)
常数项	0.939 *** (0.0147)	1.054 *** (0.0175)	1.073 *** (0.0190)	0.837 *** (0.0244)	1.068 *** (0.0261)	(0.0272)

续表

变量	名义劳动收入份额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1)	(2)	(3)	(4)	(5)	(6)
观测数	882	881	881	882	881	881
R ²	0.502	0.779	0.786	0.245	0.729	0.751
Wald Chi2	123.65[2]	239.64[8]	193.46[10]	61.28[2]	401.95[8]	366.66[10]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1) 各列中与自变量对应的数字是回归系数，圆括号中为标准误，其中“资本产出比”、“技术进步”和“实际人均 GDP”均取对数；(2) *、** 和 *** 分别表示系数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下显著；(3) 最后两行分别为各模型对应的 Hausman 检验 χ^2 统计值和概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 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 1952 - 2004》、2006 - 2008 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得到。

在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方程中，第 (1) 列只考虑使 SK 曲线滑动和平移的情况，即对资本产出比 (KtY) 以及技术进步 (Tfp) 进行回归。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的系数为负，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 1，资本和劳动呈相互替代关系，这与李稻葵等 (2009) 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我们还发现技术进步的系数为负，表明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资本偏向特征，技术进步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要素投入比例和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与预期一致。

第 (2) 列中，我们引入使 SK 曲线发生偏移的开放和转型因素。我们发现表示开放因素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相反，前者为正，后者为负。这似乎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要素份额的预测：出口将增加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求，从而派生出对劳动要素的需求并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口则将增加对资本要素的需求，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向下作用。同时，表示开放因素的外商投资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负效应，这与罗长远和张军 (2009b) 以及邵敏和黄玖立 (2010) 的研究结果一致。尽管一些研究 (白重恩、钱震杰, 2009a; 罗长远、张军, 2009a) 利用行业分解方法发现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较少有研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放入回归分析中。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第二、三产业比重的提高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且产业结构变量的引入使资本产出比和技术进步的系数 (绝对值) 明显减小。无论从系数还是显著性来看，产业结构变量的影响最大，这表明中国产业结构的非农产业化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因而，我们的研究支持“库兹涅茨事实”而非“卡

尔多事实”^①。从制度结构变动看,我们发现国企改革的影响为正,表明国有企业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与现有的研究结论一致。我们同样可以将外商投资作为制度结构变量进行考虑,外资进入通过提高经济效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而其系数显著为负。

表3的第(3)列控制了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我们发现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这一结果与罗长远和张军(2009b)的发现相同。进一步,我们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平方项显著为正,实证结果支持李稻葵等(2009)的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间的U型曲线。我们还发现加入人均GDP后模型的解释力并未显著提高,这表明开放和转型因素已经较好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变化。

另外,表3中的第(4)~(6)列为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水平方程,我们发现各变量的符号与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各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略有差异。开放因素中贸易变量的影响变得相对不显著了,而外商投资变量的负作用更明显了。另外,产业结构变量的影响仍然最大,表明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二) 差分方程的计量及结果

以上我们分析的是水平意义上的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接下来我们将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相比之前的研究,这种分析方法使我们不仅能够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其他变量变动间的关系,从而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差异影响,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探讨各变量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发生作用。为了达到所需的分析目的,根据式(7),我们首先将式(11)转换成差分方程:

$$\begin{aligned} \Delta Ls_{it} = & \alpha_1 \ln \Delta KtY_{it} + \beta_1 \ln \Delta Tfp_{it} + \gamma_1 \Delta Expt_{it} + \gamma_2 \Delta Impt_{it} \\ & + \gamma_3 \Delta Fdi_{it} + \gamma_4 \Delta Sir_{it} + \gamma_5 \Delta Tir_{it} + \gamma_6 \Delta Soe_{it} + \varepsilon_{it} \end{aligned} \quad (12)$$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没有将人均GDP的差分项放入式(12),这是因为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分解项中已包括GDP变动的影响。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式(12)构成的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由于我们对所有变量都作了一阶差分处理,因此该回归实质上是一个一阶差分模型。类似的,第(1)列和第(5)列分别为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差分方程。各变量系数的方向与水平方程保持一致,但许多变量的显著性

^① 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角度看,“库兹涅茨事实”是指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以及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导致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并不稳定的情况;“卡尔多事实”则指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并被Kaldor(1961)称为宏观经济增长中的六大特征事实之一。

和系数大小有所减小。需要强调的是，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系数显著为负，且数值（绝对值）最大，表明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最具解释力。因此，无论是劳动收入份额的水平方程还是差分方程，产业结构既能够体现劳动收入份额在各地区的差异情况，也能够反映出劳动收入份额随时间变动的趋势，再一次表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符合“库兹涅茨事实”。

表4 差分方程的基本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名义劳动收入份额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名义劳动收入份额	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组成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组成		
就业		报酬	产出	就业		报酬	产出	
资本产出比	-0.115 *** (0.00965)	-0.0157 ** (0.00758)	-0.170 *** (0.0339)	0.0479 (0.0376)	-0.0558 *** (0.0117)	-0.0157 ** (0.00674)	-0.0510 *** (0.0193)	0.00259 (0.0207)
技术进步	-0.397 *** (0.0211)	-0.0404 ** (0.0166)	-0.820 *** (0.0740)	0.388 *** (0.0822)	-0.263 *** (0.0255)	-0.0333 ** (0.0147)	-0.235 *** (0.0421)	-0.0273 (0.0453)
对外贸易	0.0217 * (0.0126)	0.0281 *** (0.00992)	0.0826 * (0.0444)	-0.0825 * (0.0492)	0.0206 (0.0153)	0.0198 ** (0.00883)	0.0392 (0.0252)	-0.0354 (0.0271)
进口渗透率	0.00211 (0.0110)	0.0166 * (0.00863)	0.0154 (0.0386)	-0.0273 (0.0428)	0.000133 (0.0133)	0.0115 (0.00768)	0.0209 (0.0220)	-0.0313 (0.0236)
外商投资	-0.160 ** (0.0648)	0.110 ** (0.0509)	1.212 *** (0.227)	-1.566 *** (0.253)	-0.301 *** (0.0783)	0.0957 ** (0.0453)	0.217 * (0.129)	-0.689 *** (0.139)
第二产业比重	-0.304 *** (0.0385)	-0.00184 (0.0302)	0.314 ** (0.135)	-0.667 *** (0.150)	-0.521 *** (0.0464)	-0.0157 (0.0269)	-0.213 *** (0.0768)	-0.344 *** (0.0826)
第三产业比重	-0.309 *** (0.0437)	0.231 *** (0.0343)	0.764 *** (0.153)	-1.366 *** (0.170)	-0.697 *** (0.0528)	0.216 *** (0.0305)	-0.138 (0.0873)	-0.851 *** (0.0939)
国企改制	-0.00967 (0.0204)	-0.173 *** (0.0160)	-0.868 *** (0.0716)	1.025 *** (0.0795)	-0.0403 (0.0246)	-0.141 *** (0.0142)	-0.443 *** (0.0407)	0.541 *** (0.0438)
观测数	850	850	822	822	792	822	822	822
R ²	0.410	0.204	0.297	0.301	0.338	0.190	0.162	0.279

注：(1) 各变量均取一阶差分，“资本产出比”和“技术进步”均取对数，自变量对应的数字是回归系数，圆括号中为标准误；(2) *、**和***分别表示系数在10%、5%和1%的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200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得到。

为了进一步理解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机理，我们利用式(8)、(9)和(10)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出变动三大渠道进行回归估计。对于各渠道

的回归方程,我们仍用最小二乘法分别获得各渠道的一阶差分回归估计。同样,我们分别考察了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机理。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结果为表4中第(2)~(4)列,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结果为第(6)~(8)列。

通过横向比较各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三大分解效应的影响,我们可以实证分析各变量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机理,即该变量通过就业、报酬和产出三大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产生综合影响。在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方程中,我们发现资本产出比的就业效应和报酬效应为负,表明资本主要通过负向的就业和报酬效应替代劳动。类似地,技术进步的就业和报酬效应为负,且大于正向的产出效应,这意味着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

开放因素中的出口贸易一方面通过增加就业和工资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则通过提高产出使劳动收入份额降低,两种作用相互抵消,使综合效应呈边际正向显著,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开放因素中的外资变量主要通过增加就业和报酬的方式对劳动收入份额发生正向作用,具有较为显著的“工资溢价”效应。然而,外资变量通过增加产出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向下的冲击,且产出效应要超过“工资溢价”效应,从而成为促使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直接论证了罗长远和张军(2009b)有关外资变量影响机理的猜想。外资企业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工资升水效应,然而其劳动边际产出要远大于其他两类企业,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显著降低。我们认为,必须肯定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但是也必须认识到相对于如此高的生产率,其支付的劳动报酬则是偏低的。这意味着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仍是吸引外资进入中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中国产业结构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化过程中,经济效率和发展速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产出效应为负且大于就业和报酬所产生的正效应,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向下冲击作用,再一次验证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符合“库兹涅茨事实”。与水平方程略有差异的是,差分方程中国企改制的系数不再显著,这是产出的正效应与就业和报酬的负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

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结果与名义劳动收入份额保持基本一致,表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同时我们也发现回归结果存在一些细微差异。其中,出口变量的影响变得相对不显著。另外,产业结构变量的系数与之前略有不同,第二产业具有负的报酬效应。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工业产业的发展可能带来名义劳动报酬的增长,但不利于实际劳动者报酬的增长,进而阻碍了实际劳动收入

份额的增加，工业化将通过叠加报酬和产出两种负效应加剧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速度。我们还发现在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归中，产业结构变量的负效应相对更大，因而劳动收入份额的“库兹涅茨”效应更为明显。

五 结论和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利用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公式，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值三类变动效应。基于分解公式，我们不仅区分了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三类分解效应，而且分别考察了全国和各省改革开放以来劳动收入份额三类效应的变动情况。名义和实际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都表明，就业变动效应影响相对较小，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由报酬和产值效应相向变动所得的净效应决定。同时，各省实际和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结果与全国实际和名义劳动收入份额的分解结果较为一致，表明三类变动效应及其相互关系在各省间呈趋同态势。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就业、报酬和产值三类变动效应，既有助于分渠道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也有助于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基本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从而使分析更具经济含义。通过分解，我们能够明确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受到劳动供给和需求数量、劳动力的价格水平和整体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及其程度。我们还发现，名义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报酬和产值效应与价格水平的波动有着密切联系，这将使我们难以分离价格因素带来的影响，并错估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幅度甚至方向。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分解效应使我们能够重新评估和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和原因，从而反映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动的真实情况。

其次，本文利用197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及其决定因素。我们利用新古典框架考察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不仅考虑了包括传统的要素投入比例和技术进步变量，还考虑了包括以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衡量的开放因素和以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表示的转型因素。我们利用水平和差分方程分别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及其变动的决定因素。我们发现，中国资本和劳动存在较强的替代关系，且资本要素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进一步导致要素分配向资本倾斜。同时，水平和差分方程的回归结果都表明，以第二、三产业比重衡量的产业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这意味着从地区层面来看，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符合“库兹涅茨事实”。另外，开放因素中贸易变量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预测，外资变量则对劳

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考察了各变量如何通过就业、报酬和产出三大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我们发现,资本主要通过负向的就业和报酬效应替代劳动,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替代作用。对外贸易的综合效应由于两种作用相互抵消呈边际正向显著,较符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外资变量的产出负效应要超过“工资溢价”效应,从而促使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产业结构的产出负效应超过其他两种效应,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向下冲击作用并支持劳动收入份额的“库兹涅茨事实”。

为了进一步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的产业结构仍将继续由农业部门向工业转换,同时,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这两种结构转换的明显特征是产业结构从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行业向劳动收入份额较低的行业转换。因此,产业结构的这两种变换趋势都将是劳动收入份额的不利因素。然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业化进程完成以后,经济逐步向后现代化迈进,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服务业相对于工业的高劳动收入份额又将使劳动收入份额重新提高,因而拓宽服务业的发展空间有利于防止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因此,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需要考虑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动是否改变了劳动和资本分配的格局,是否导致了劳动和资本的分配偏离了均衡路径。我们认为,政府在推进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时,一方面须从依靠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另一方面须向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调控产业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速度应当以既能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升级的要求,又能使中国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分配格局为目标。

参考文献:

- 白重恩、钱震杰(2009a),《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3期,第27-41页。
- 白重恩、钱震杰(2009b),《我国资本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及变化原因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37-147页。
-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2008),《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8期,第16-28页。

- 蔡昉 (2010),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研究》第4期, 第4-13。
- 蔡昉、都阳 (2011), 《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 《经济学动态》第9期, 第9-16页。
- 龚刚、杨光 (2010a), 《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第54-68页。
- 龚刚、杨光 (2010b), 《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 《管理世界》第5期, 第45-55页。
- 郭庆旺、吕冰洋 (2011), 《论税收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经济研究》第6期, 第16-30页。
- 郭庆旺、吕冰洋 (2012), 《论要素收入分配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第12期, 第46-62页。
- 黄先海、徐圣 (2009), 《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 《经济研究》第7期, 第34-44页。
- 姜磊、张媛 (2008), 《对外贸易对劳动分配比例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第10期, 第26-33页。
-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 (2009), 《GDP中劳动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 《经济研究》第1期, 第70-82页。
- 林毅夫、李志赞 (2004), 《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 《经济研究》第2期, 第17-27页。
- 罗长远、张军 (2009a), 《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第65-79页。
- 罗长远、张军 (2009b),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管理世界》第5期, 第25-35页。
- 潘士远 (2007), 《贸易自由化、有偏的学习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差异》, 《经济研究》第6期, 第98-105页。
- 钱震杰 (2011), 《中国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份额研究》,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 单豪杰 (2008), 《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年》,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0期, 第17-31页。
- 邵敏、黄玖立 (2010), 《外资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季刊)》第4期, 第1189-1210页。
- 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 (2010),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 ——来自中国的经

- 验证据》，《经济研究》第5期，第68-81页。
- 王永进、盛丹（2010），《要素积累、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占比》，《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第33-50页。
- 翁杰、周礼（2010），《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研究：1997~2008年》，《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第31-45页。
- 肖红叶、郝枫（2009），《中国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及其国际比较》，《财贸经济》第2期，第13-21页。
- 肖文、周明海（2010），《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的比较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3期，第69-76页。
- 张车伟（2012），《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总体工资水平估算及分析》，《经济学动态》第9期，第10-19页。
- 周明海（2014），《实际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估算及其变动趋势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1期，第108-116页。
- 周明海、肖文、姚先国（2010），《企业异质性、所有制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管理世界》第10期，第24-33页。
- Acemoglu, Daron (2003). Labor-and 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37.
- Bai, Chong-En & Zhenjie Qian (2010). The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China: 1978 - 2007. *China Economic Review*, 21(4), 650-670.
- Bentolila, Samuel & Gilles Saint-Paul (2003). Explaining Movements in the Labor Share. *Contributions to Macroeconomics*, 3(1), 1103-1136.
- Decreuse, Bruno & Paul Maarek (2008). FDI and the Labor Sha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Theory and Some Evidence. Accessed June 8, 2014,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1224/>.
- Dunning, John Harry (1988). *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London: Unwin Hyman.
- Helpman, Elhanan, Marc J. Melitz & Stephen R. Yeaple (2004).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4(1), 300-316.
- Kaldor, Nicholas (1961).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Friedrich August Lutz & Douglas Chalmers Hague (eds.), *The Theory of Capit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Kalleberg, Arne L., Michael Wallace & Lawrence E. Raffalovich (1984). Accounting for

Labor's Share: Clas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rinting Industry. *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37(3), 386 – 402.

Lin, Justin Yifu & Guofu Tan (1999).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426 – 431.

Melitz, Marc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6), 1695 – 1725.

Decomposition and Mechanism of Movement of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

Zhou Minghai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composes the movement of labor income share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to employment, compensation and output effects. We find that the movement of labor income share is mainly determined by the net effects of the opposite movement of compensation and output effects, and the employment effect is relatively small. Meanwhile,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decomposition of nominal and real labor income share, and finds that the real labor income share reflec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of China. By using level and difference equations, the paper not only discusses the determinants of labor income share, but also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movement of labor income share. We find that the affecting mechanisms of each variable on labor income share through three channels are different, bu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and practical prediction. The output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able exceeds the other two effects, and the overall effec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the largest impact on the decrease of labor income share, which supports the "Kuznets fact" of movement of factor income share.

Keywords: labor income share, employment effect, compensation effect, output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E22, E23, E24, E25

(责任编辑：贾 朋)